

【论 文】

# 语言、差异政治与“民族”构建： “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历史

马雪峰<sup>1</sup>

白族是今日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在当代中国的民族结构中，属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时，白族人口 1858063 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2003），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也有少量分布（张丽剑、王艳萍，2009：139）。本文之主要目的，在于梳理近代以来围绕这一族群的名称（“白族”）与语言（“白文”）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以探讨晚近以来中国社会有关人群分类的观念和实践，特别是与“民族”有关的诸多观念和实践。

## 一、白族的识别

今天被称为“白族”的这一人群，其识别与确认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0-1956 年，1980 年代为第二阶段。

### （一）1950-1956

1950 年代初，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是否为一单独的“非汉”民族，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1940 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曾到大理喜洲工作与调查，后来，他根据其对喜洲的调查，写作了著名的民族志作品《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在这本著作中，许烺光这样描述喜洲人：

……在喜洲，男女均身穿汉族服装，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均缠足裹脚，但人人都说民家话<sup>2</sup>。除此之外，多数男人和为数不多的妇女还可以说云南方言，但带有很重的喜洲口音。……当地人的种族起源仍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一般说来，喜洲，县府，以及邻近的村寨整个地区形成了云南境内一个“民家”地区。然而，所有的喜洲居民和附近九村中八个村子的居民都坚持说他们本是汉族血统。他们中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祖先从中部的某个省份迁徙至云南的故事……喜洲人坚持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很不高兴。喜洲人强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对未婚女子的贞操和已婚妇女的贤淑同样十分注重。喜洲人对祖先崇拜的程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实表明喜洲人不仅具有汉族文化习俗，而且试图表明，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民族更加汉化（许烺光，2001：15-17）。

《祖荫下》一书，许先生以喜洲“民家”人为个案来分析中国文化与人格，民家人与民家人的文化被视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典型。实际上，民家是被许先生当作“汉人”来分析的。许氏大作初版于 1948 年，而仅仅 8 年之后的 1956 年，这一被许烺光视为汉人典型的“民家”被识别

<sup>1</sup>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sup>2</sup> 《祖荫下》繁体字版 16 页原文是“……在喜洲，男女均身穿汉族服装，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均缠足裹脚，但人人都说话”（许烺光，2001：16），漏了“民家”两字。



为非汉的“白族”。

1956年之前，“民家”是对今日洱海一带白族的通常称谓，1956年，经过民族识别，大理一带的“民家”，维西、兰坪一带的“那马”，碧江、泸水一带的“勒墨”，<sup>1</sup>洱源的“土家”，<sup>2</sup>被统一称为“白族”（云南少数民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大理分组，1961）。

根据杨永新<sup>3</sup>的回忆，1955年春，政府开始筹建大理民族自治州的工作，中共大理地委委托杨永新起草关于建立大理民族自治州的报告。“在自治州的筹建过程中，如何确定大理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称谓”是首要而棘手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棘手的是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即这一群体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如果是，那么，其族称是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主要是两种观点，即（1）这一群体是一独立的民族，（2）这一群体是汉族的分支。

主张汉族说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如当时的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森林学家、剑川人张延福（字海秋）先生，以及当时已经故去的大理剑川知名学者赵式铭先生（杨永新，1986：77）。民国时期，赵先生著有《白文考》一文，开白文研究之先河，收入《新纂云南通志》（2007）。张先生著有《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1937）一文。二人皆从语言研究入手，皆主张白族乃是汉族的分支。

主张独立民族说者，今日不见其文献，杨永新《漫忆当年建州时》一文也仅简单述及：“但是，经过民族识别的逐步深入，白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一问题也就十分明朗，被大家所公认了”（杨永新，1986：77），晚近有关白族族源的讨论，多在“白族”这一框架下进行，且，相关文献发表的时间，都是在“白族”这一名称被确定之后。

既然民族识别已经认定这一群体为一个单独的民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这个群体确定一个族称了。为此，大理专员公署于1956年4月间，召开了专门的会议，以解决族称问题（杨永新，1986：77）。会议结果，形成了《关于协商白族名称情况报告》，报告之主要内容如下：

座谈会上最初有两种意见：少数人主张保留“民家族”的名称，理由是这个名称相沿已久，而且含有尊称义，“民家”与“官家”相对，表示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团结；多数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民家”含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意思，本民族自称“白子”，义为“白人”，而“民家”与本民族毫无相关。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统一称为“白族”。至于，在书写时作“白”还是“𤎑”，也有两种意见：主张用“白”字的认为，“白子”尚白，历史上有“白国”、“白王”，“白”有清白、纯洁、朴实、诚恳、光明义，“白”字比“𤎑”易写；主张用“𤎑”的则认为，“白”与共产党红色当政相冲，而“𤎑”是砍柴人，是劳动人民。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统一采用“白族”。（施立卓，2007）

族称确定为“白族”后，由大理专署专文报请云南省人民政府转报国务院。七个月之后的195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宣告成立（杨永新，2007：78-83）。

1961年《白族简史》（初稿）在大理铅印内部出版。

## （二）1980年代

白族民族识别的第二阶段乃是1980年代对云南以外地区白族的识别。主要涉及对贵州毕节地区“七姓民”、<sup>4</sup>“南京人”、“龙家”<sup>5</sup>，以及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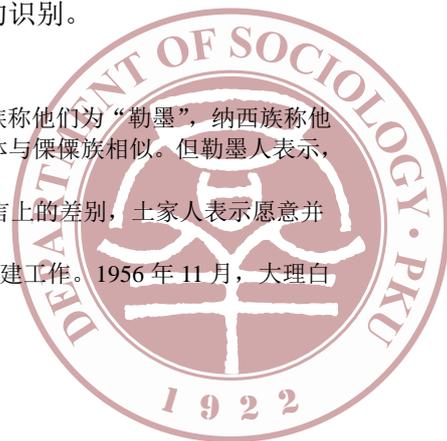
<sup>1</sup> 据1950年的统计，“勒墨”有4000人，分布在碧江、维西、福贡等县，傈僳族称他们为“勒墨”，纳西族称他们为“那马”，语言与民家话大体可以通话，社会经济深受傈僳族的影响，大体与傈僳族相似。但勒墨人表示，他们与民家是一家，与傈僳不是一家（黄光学、施联朱，2005：168）。

<sup>2</sup> 自称“白夥”，语言上与邓川、洱源、大理等地的民家话可以通话，但存在发言上的差别，土家人表示愿意并入民家（黄光学、施联朱，2005：168）

<sup>3</sup> 杨永新，白族，五十年代初期，任大理专署专员，参加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筹建工作。195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杨永新为副州长。

<sup>4</sup> 即张、李、苏、赵、杨、钱、许等姓（谢忠毅，1997：87）。

<sup>5</sup> 亦称“农”或“依家”（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23）。



## 1、贵州“七姓民”“返本归源”

“七姓民”主要分布在贵州毕节地区。1950年代初，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到贵州时，贵州各地申报的民族名称达八十多个，其中有“七姓民”。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派出识别调查组到贵州，调查组调查了穿青人等10个人群，其中也涉及“七姓民”。根据1953年的普选登记，“七姓民”有460人，他们自称是从云南民家分出来的，但已不会讲民家话，“七姓民”中，有的会说彝语，有的不会，通用汉语。当时调查组的意见认为，“七姓民”人数较少，不宜为单一民族，可按其自愿，归入民家、彝族或汉族（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22-226）。此后，在报民族身份时，“七姓民”有报民家族者，报七姓族者，报彝族者，报白族者，也有报汉族者（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4）。

19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中的民族识别工作也被重新提出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民政字第166号文件部署了民族识别工作。在这种形势下，贵州省民委也成立了专门的民族识别办公室，专门负责民族识别工作。到1980年代初，贵州省仍有23个人群需要识别，其中就有“七姓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27-228）。

1981年9月，威宁县成立了民族识别办公室，开展对“七姓民”的识别工作。调查组主要根据宣统《贵州地理志》中“白儿子在威宁”的记载，以及彝族中“七姓民不是彝族，也不是汉族，而是彝族皇帝家”的说法，认为“彝族皇帝家”可能是指大理国王白族段氏。调查组查阅了《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云南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大理文化》、《贵州通志》、《大定府志》、《东川府志》、《宣威县志》、《南诏野史》等资料，亲自到云南大理等地考察，拜访和征询了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著名白族学者马曜，云南民族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白族史专家王叔武，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族学者张旭，以及《大理文化》主编李一夫，大理州民委主任杨群等白族领导同志的意见。马曜等白族领导同志都同意“七姓民”认定为白族，“七姓民”也表达了愿意认定为白族的意愿。因此，威宁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4月召开了“七姓民”代表座谈会，讨论并通过了威宁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七姓民返本归源为白族的调查报告》。县政府以[威府发]15号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同年6月，地区行署正式同意将威宁七姓民认定为白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1997：316-318）。之后，赫章、水城等县的七姓民也申请报批为白族，至此，贵州“七姓民”7589人被认定为白族（严奇岩，2009：28；黄光学、施联朱，2005：170；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30）。同年，大方县人民政府对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批准段、李、张、王四姓返本归源的报告》的批复[（1982）]确认全县段姓116户516人为白族（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5-686），另外，纳雍县的尚姓“返本归源”为白族（谢忠毅，1997：86）。

## 2、“南京一龙家”人的认定与识别

“南京一龙家”的族属问题，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吴正彪，2009：71）。195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带领的中央民族识别工作组在《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的初步调查资料》中这样界定“南京一龙家”：

根据现有材料看，南京一一龙家的历史基本上是这样的：龙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明初成祖夺建文帝位，有一部分忠于建文的臣子不愿受成祖统治，逃入水西土司地区，“以夷变夏”，隐蔽起来。他们依附龙家，改变原来的风俗习惯，去原姓，对外自称龙家。但事实上却保持了自己的集团，力求不和少数民族（包括龙家在内）相混；不相通婚，保存暗姓和宝器（祖传的印笏等），加强内部的团结。集团还分上下层，有等级区别，也不通婚。“南京人”这个名称是近百年，有人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因为政治上已不再需要隐蔽了。而且他们有逐步和原来的龙家分开的趋势。在实际应用上，到现在，南京人和龙家两个名称还是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所以我们用“南京一龙”来表示这个联合性的集团。南京人原是汉人，但在过去五百多年中已接受少数民族很深的影响，而且曾主动的改风易俗，学习彝语，心理

上和其他汉人有距离，经济上也曾一度 and 汉人割断。因此，从民族特征各方面来看，他们确曾一度发生过一定的变化，这是和穿青的情况不同的。<sup>1</sup>

对于“南京—龙家”民族成分问题，调查组的意见是：

南京人原系汉人，但已和龙家长期联合在一起，风俗习惯已有变化，心理上 and 汉人有隔阂。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愿意做少数民族是可以承认的。但南京人脱离龙家单独成为一个民族单位是不合适的。现在南京人和龙家在名称上还没有取得一致。（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6）

据 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初步调查材料汇综》的说明，因当时在族称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没有上报国务院认定公布（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6）。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南京—龙家”也因此没能成为单独的民族。

根据《贵州省志·民族志》的记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贵州省开始重新开展对“南京—龙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南京人、龙家分布的毕节、安顺、六盘水、遵义等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工作。1983 年，贵州省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1984 年 2 月 19 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安顺召开“南京人——龙家”族别问题科学讨论会，代表们达成以下共识：

……“南京人”、“龙家”几百年来就凝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谁主谁宾，无从分辨”的水乳交融的人们共同体，早就为各兄弟民族所承认，因而议定“南京人——龙家”族称为“南龙族”，并根据“南龙族”这一族称，科学、客观地整理识别材料。1985 年 3 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领导亲自带报告到北京，和有关专家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汇报，请求认定“南龙族”为单一民族。（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6）

然而，这一要求没能被国家民委所接受，国家民委根据“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单位”的要求，明确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6）民政字第 252 号《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精神走认同道路，即“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即其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又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6-687）

“南京—龙家”成为“南龙族”的努力失败。他们只能从已认定的民族单元中选择认同对象。据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一书载，“1986 年 06 月，贵州省民委就‘龙家’（‘南京’）人族属问题广泛征求意见，有龙家代表人士提出，据传龙家与云南白族历史上有渊源关系，例如，本省龙家的赵姓家族有‘家门分在大理’的说法”（黄光学、施联朱，2005：174）。

1987 年 7 月，贵州省民委组建由 16 人组成的“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认亲”。考察组回贵州后，写成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报告》，组建了“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抽调人员从事认定工作：

如毕节县，下发了（87）75 号文件，由海子街、鸭池、朱昌、长春等区抽调专人，在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力量，深入“南龙人”所在区、乡、村寨开展宣传工作。走遍了全县 15 个区（镇）、62 个乡（镇）、88 个村、7 个派出所、4 个办事处、8 个居委会、4 所大中专学校，召开大、小型会议 32 次，并进行 470 多人次的个别走访座谈，反复宣传讲解，同时还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工具大量宣传。……（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7）

1988 年 3 月，贵州省民委负责人召集在贵阳工作的部分龙家（南京）代表座谈，“进一步沟通思想，促进认定。继之，毕节地区各县人民政府相继分别召开了“南龙人”认定白族工作代表

<sup>1</sup> 笔者一直未能找到这一文献的纸质版本，所引用者来自网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a33d90100a6jf.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a33d90100a6jf.html)



大会。1988年1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毕节地区龙家(南京)64608人为白族(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2: 687-688)。

### 3、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据谷忠诚回忆, 1977年, 他到昆明探亲时, 在弥勒寺<sup>1</sup>一带见到过白族妇女的装束, 觉得和湖南桑植民家人的打扮很像。1980年代初, 湖南省桑植县开展“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 对全县少数民族成分进行全面考察, 谷忠诚本人参加了这一工作。1982年, 桑植县恢复了20多万人的土家族成分。在这一过程中, 既不同于汉人, 也不同于土家族的“民家人”的民族成分问题, 被提了出来(谷中山, 2006: )。谷忠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掌握的材料, 向上级提交了《关于桑植县“民家人”应认定为白族》的报告。1982年春, 湖南组成省、州、县民族联合调查组, 调查“民家人”族属问题(张丽剑, 2007: 55)。

桑植“民家人”的来源, 众说纷纭, 大体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说法, 外来说中, 又有来自云南、来自江西、来自四川、来自陕西等多种说法。调查组的调查支持了外来说中来自云南的说法, 即, 南宋末年时, 蒙古军攻破大理国后, 在云南征召了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寸白军”, 以帮助蒙古人包抄南宋。南宋灭亡后, 这些军人多被遣返回云南, 少数兵士流散到长江沿岸, 其中有姓谷、王、钟等姓的几个兵士经江西最后流落到桑植, 繁衍至今。而且, 调查组认为, “民家人”有自己的特点, 不同于汉, 也不同于土家, 与大理白族比对时, 也较为相似, 因此, 调查组认为, 桑植“民家人”要求认定为白族的依据充足。1984年六月二十七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确认桑植县民家人为白族, 成立了七个白族乡镇(吴万源, 1985: 40-47; 谷忠诚, 2006: 285)。1984年底, 桑植全县有93357人登记为白族, 此后, 大庸、慈利、武陵源、沅陵以及湖北鹤峰等区县, 又恢复了两万多人的白族成分。

如上所述白族的识别过程, 从人口分布上可窥一斑。

1951年, 中央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在其给政务院的报告《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sup>2</sup>中, 提及西南地区七个大的少数民族, 其中第六大民族是民家, “约有六十万人, 主要住区在云南剑川、大理、鹤庆一带”(刘格平, 1953: 40)。1956年“白族”这一名称被确认时, 白族绝大部分分布于大理地区。查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全国有白族人口706623人, 其中, 有704012人分布在云南, 云南白族人口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达99.6%, 仅0.04%(2611人)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之外的其他地区(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统计局人口处、云南省公安厅三处, 1990: 15)。

表 1: 白族人口的分布 (一)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

	人数	百分比
云南	1121299	99.04
四川	3076	0.27
贵州	4858	0.43
湖北	216	0.02
湖南	155	0.01
全国其他地区小计 <sup>3</sup>	2620	0.23
总计	1132224	100.00

资料来源:《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 1985)。

到 1982 年时, 白族人口的这一分布格局, 比之 1964 年, 并没有大的变化, 如下表所示。根

<sup>1</sup> 昆明地名。

<sup>2</sup> 1951 年 5 月 11 日在政务院第八十四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 并经同次会议批准。

<sup>3</sup> 其他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有白族分布, 但人数极少, 除北京(420 人)外, 其他 2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白族人口均不到 200 人。



据 1982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白族总人口为 1132224 人，其中，1121299 人分布在云南，云南白族人口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达 99.04%，只有不到 1% 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以外的其他地区，贵州白族人口 4858 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 0.43%，湖南白族人口 155 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 0.01%，湖北白族 216 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 0.02%。因此，1982 年之前，白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绝大部分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省。重大的变化发生在 1982 年之后。根据 199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如下表所示。1990 年时，全国白族人口 1598052 人，其中，云南白族人口 1341508，占全国白族人口的比例，从 1982 年的 99.04% 下降到 83.95%，下降了近 16 个百分点。而贵州白族人口由 1982 年的四千多人，猛增到 123307 人，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也有 0.43% 猛增到 7.72%，贵州的白族人口在八年之间增长了近 26 倍。白族人口同样增长迅速的还有湖南省，1990 年时，湖南白族人口由 1982 年的 155 人，增加到 114843 人，白族人口增长了近 741 倍。如前所述，白族人口分布的这种重大变化，与 1982 年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身份的更改）有关。

表 2：白族人口的分布（二）（1990、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

	1990 年		2000 年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云南	1341508	83.95	1505644	81.03
四川	7420	0.46	7335	0.39
贵州	123307	7.72	187362	10.08
湖北	1156	0.07	7173	0.39
湖南	114843	7.19	125597	6.76
其他地区小计	9810 <sup>1</sup>	0.61	24952 <sup>2</sup>	1.34
总计	1598052	100.00	1858063	100.00

资料来源：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来自《中国民族人口资料（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1994：656-683）、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来自《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光盘版）（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2003）。

## 二、白族“族源”相关论争

从 1950 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实践来看，对某一少数民族的识别，“族源”至为关键。有关“白族”的识别，也无法回避族源问题。1956 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前后（1956 年 9 月至 1957 年 1 月），云南学术界在《云南日报》上就白族的族源和形成问题曾展开了大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白族的族源、白族的形成以及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白文”问题展开<sup>3</sup>。

关于白族的起源，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杨堃先生总结了历史上流行的有关白族来源的四种理论：即（1）白族是傣族说；（2）印度阿育王之后说；（3）白族是羌族说；（4）白族是汉族说（杨堃，1957：1）。此次论争中，没有学者持傣族说<sup>4</sup>，有少数学者坚持印度阿育王之后说<sup>5</sup>。因此，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原来的汉族说、羌族说，以及此次论争中兴起的土著民族说、多种种族融合说之间（任方，1957：131-137）。

### （一）汉族说。

持汉族说者认为白族乃是由迁入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形成的。这一说法，在 1950 年代之前，

<sup>1</sup> 其他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sup>2</sup> 其他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sup>3</sup> 云南人民出版社将讨论发表的文章以及未曾发表的几篇文章集成了一个集子，并附上了任方先生的总结文章《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杨堃等，1957）。

<sup>4</sup> 此一理论在泰国学界有重要影响。

<sup>5</sup> 如云南文史馆赵冠三先生（任方，1957：131）。



影响颇大，著名白族学者赵式铭、张海秋都是这一理论的主张者。此次论争中，主张白族为汉族说者，主要是秦凤翔以及徐承俊两位先生。主张汉族说者，从赵式铭、张海秋，到秦凤翔和徐承俊，无一例外的，皆从语言入手。

一般认为是白族祖先的僰人，秦凤翔则认为，唐以前，僰指的是彝族。云南今日的白族是从楚蜀两方迁来混合而成的。“白”乃是当地彝族（自称黑人）对这些外来者的称呼（秦凤翔，1957a：21-22）。

徐承俊同意秦凤翔的看法，认为白族是从蜀、楚两方面迁来混合而成的，除此之外，徐氏还认为，“其中的不少一部分人是来自蜀、楚以外的”（徐承俊，1957：60-61）。

## （二）氏羌说

持此说者，认为白族乃是古羌族之一支。

龚自知认为，“白蛮”乃是介于“蛮”与汉之间的一种混合部族，白族是白氏掺和着彝、汉所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龚自知，1957：36-43页）。

杨毓才则主张认为白族是由迁到洱海地区的氏人与昆明部落不断交往融合而成的（杨毓才，1957：27）。周泳先认为云南白族乃是羌族的一支，从中国西北迁徙而来（周泳先，1957：55）。

## （三）土著说

无论是汉族说还是氏羌说，皆认为白族乃外来民族，而杨堃等学者则认为，白族乃是云南的土著民族。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区分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即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杨堃认为，白族是一种部族共同体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共同体。具体而言，杨堃认为，作为白族的部族，从南诏时代开始形成，到大理国时代始得到发展和巩固，二十世纪开始，白族开始向资本主义民族过渡，但到解放前，这种过渡并没有完成，解放后，特别是土改后，由部族过渡到民族的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白族加速向社会主义民族过渡。套用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共同体的四个特征，杨堃归纳了白族的四个特征：共同的语言——白语，白族共同的地域——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共同的经济生活——大理三月街等，白族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心理素质——白语、本主崇拜、民家调等。因而，杨堃认为，白族是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杨堃，1957：1-11）。

马曜认为白族乃是源出于汉代洱海地区的昆明人<sup>1</sup>（马曜，1957：62-77）。

李一夫基本上同意马曜的意见，对于白语中有很多汉语词汇的问题，李一夫认为乃是白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李一夫，1957：78-82）。

## （四）多种族融合说

“多种族融合说”的代表是云南大学的方国瑜，方先生认为不宜固执种族成分来说明民族的形成，白族是历史上由外来的族系和洱海地区原有的族系部落结合而成的。对于白语中汉语词汇特别多的原因，方氏认为是白族不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方国瑜，1957：44-50）。

# 三、“白语”与“白文”及其相关论争

理论上讲，“白族”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独特的“白族性”，而白族的这一独特性，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差异性。因此，寻找和论证这种差异性，乃是白族史建构的关键一环。白族之识别，以“民家”为基础，而“民家”与汉人之区别，关键在于语言，即民家话<sup>2</sup>。因此，与白族讨论相伴随的，是有关“白语”系属和“白文”

<sup>1</sup> 马曜先生2000年时发表文章《白族异源同流说》，主张“白族是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就进入青铜文化时期的“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了西迁的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人，同时吸取了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个开放性的民族共同体。”（马曜，2000：71）。

<sup>2</sup> 1944年夏，郑天挺携西南联大师生访问大理时，曾听人言及“民家人有三特征：说民家话，不缠足，以黑布裹髻是也（郑天挺，2003：37）。很显然，“不缠足”和“以黑布裹髻”皆是易变的装饰，“说民家话”则构成了

的论争。争论的焦点在于白语属于哪个语支？（是汉语支？汉语方言？还是彝语支？）以及“白文”是否存在？

### （一）白语的系属问题

白语的系属，也众说纷纭，秦凤翔先生曾经总结过有关白语系属的五种说法：（1）蒙克墨语系说（英人戴维斯主张），（2）羌语的一支，（3）为突厥语的一支（向达主张），（4）白语为傣语的一支（丁文江主张），（5）白语为彝语的一支（罗常培、傅懋劫主张）<sup>1</sup>，而秦凤翔自己，以及赵式铭、张海秋、龚自知、徐承俊等学者的主张，则构成了第六种说法，即（6）白语为汉语支或汉语方言说。<sup>2</sup>前四种理论，国内学界逐渐少有人支持，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后两种说法，特别是第六种说法。

在张海秋和施泽新的帮助下，秦凤翔将剑川白语中几千个字的字音同代表汉语六朝时期语音的切韵系统做出了对应总表，根据这一比对，秦氏认为“我们可以判定白语的主要成分与湘赣江浙等汉语方言（古东楚、南楚之地）显然是一个最亲密的亲属语言。但此外也还有少数基本词汇是由古蜀语中遗留下来的”，因此，秦凤翔认为，“现代白语是一种由以古楚语为基础而掺有古蜀语成分的，自齐梁以至明初独立发展而成的，但与汉语仍为同一系属的语言”（秦凤翔，1957a: 20）。徐承俊同意秦凤翔的说法，白语和汉语是同一系属的语言，（徐承俊，1957: 60-61）。

龚自知认为白语和古代汉语、明代汉语的吴语都很接近，但名物、语法还有所不同（龚自知，1957: 36-43页）。

高光宇认为“现代白语与现代汉语确有很密切的亲属关系，也可以说是堂弟兄般的亲近，但绝不是直接系属于古代汉语，更不是现代汉语方言之一，所以不能把白语列入汉语族内”（高光宇，1957: 98）。

叶琴侠不同意徐承俊关于白语是系属汉语，白族是汉族的一支，是蜀、楚和蜀、楚以外的说法，认为白语应属于藏缅语族，是彝语的一支（叶琴侠，1957: 106-110）。

### （二）“白文”问题

与“白文”相关的问题在于，白族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白文”？对于这一问题，也争议颇多。大致可以归纳为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

#### 1、历史上有“白文”

杨堃认为，大理国时期，白族文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白文”即这种成就的表现之一，“过去有许多人全不承认白族有文字，这是不正确的。实则白族自己创造的文字就是‘白文’，这是在大理国时代创造的。”（杨堃，1957: 8）。

孙太初同意杨堃的看法，认为白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他们自己的文字——“白文”。但孙先生不同意杨堃先生关于“白文”创造于大理国时期的看法，认为“白文”在南诏时代即已形成，但由于社会发展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种“白文”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发展，而逐渐为汉字所代替了。（孙太初，1957: 122）

开“白文”研究先河的石钟健先生也认为白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白文，“中古时代住在云南西部的白族，由于需要，曾利用汉字作为表意的和记音的符号，拟制了一套文字，这种文字，他们称为‘白文’”（石钟健，1957: 125）。但石钟健认为，明代中叶以后，“白文”就逐渐被废弃了。

#### 2、历史上没有所谓“白文”

1950年代以后，虽然有学者认为白族历史上确曾创造过“白文”这样一种文字，但正如石钟健先生所言，“研究白族历史和语言的学者，对于白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大多表示怀疑”（石钟健，1957: 125）。如徐嘉瑞先生在其所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中认为，白族“自己并无何种特殊之文字，……以汉文记民家语及唱词者，然文字仍为汉字，非有特殊之字母也”（徐嘉瑞，2005:

---

一个显著性的区别。

<sup>1</sup> 叶琴侠、赵衍荪也主张此说（叶琴侠，1957: 106-110；赵衍荪，1982: 156）。

<sup>2</sup> 另外，也有学者主张白语应当为藏缅语族一个单独语支——白语支者（周耀文，1978），也有学者主张白语为汉族语系中一个单独的语族（高光宇，1957: 100）



113)。

杜乙简也认为，“白族只有共通的白语，而无本民族自己共通的文字——说有，那就是汉字了”（杜乙简，1957：86）。

实际上，有关白文系属以及“白文”有无的讨论，所服务者，乃是白族及其历史的构建。而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历史上是否有“白文”，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白文”的。因此，如果非要有白文，只有走上创造“白文”的道路。

#### 四、结语：创造“白文”

为创造白文，到目前为止，相关政府机构和学者共制定过三个《白族文字方案，即1958年文字方案、1982年文字方案、以及1993年文字方案。

##### （一）1958年文字方案

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方言志》，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三工作队制定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以下关白语（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sup>1</sup>，这一方案没能实践。在1958年后的社会背景中，汉语是白族人民的通用语的说法被强调。如1962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有如下表述：

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由于历史上大量汉族人民不断融合于白族之中，而白族人民又长期学习先进汉族文化，因而，白语中含有大量汉语词汇，大部分白族人民通晓汉语，而居住在白族地区的汉族人民也使用白语，千百年来，汉文一直是白族人民所习用的通行文字。（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1962：1）

1965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作如下表述：

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与汉族居住一起，许久以来，汉文已逐渐成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白族和州内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积极要求汉语、汉文，用汉文扫盲，汉语、汉文已成为各民族人民通用的交际工具。（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5：251）。

##### （二）、1982年白文方案

1982年，在“落实民族政策”的背景下，大理州政府和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建了白文研究小组，修订了1958年的方案，改为以中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剑川金华镇为标准音。方案修订后，随即在剑川县金华镇开办了白文师资培训班。1985年，云南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昆明举办了白文中级培训班。剑川县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召开“推行白文工作会议”，并在甸南乡西中小学进行了教学实验。（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367-368）。

然而，尽管多方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民众参与的热情很低，特别是在南部方言区，在周城村实践时，参加学习班的人数逐渐减少，最后以“没有时间学习剑川白文”为由解散了学习班（甲斐胜二，1997：62）。

##### （三）1993年白文方案

1993年06月，云南省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了“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又一次修订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93年的白文方案采用一个方案拼写两个方言的办法，

<sup>1</sup> 根据徐琳、赵衍荪编著的《白语简志》，各地白语在语音上差别较大，一般将白语划分为中部、南部、北部三个方言，即剑川方言、大理方言和碧江方言，剑川方言又分为剑川、鹤庆两个土语，大理方言分为大理、祥云两个土语，碧江方言分为碧江、兰坪两个土语。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比较接近，剑川方言、大理方言和人口较少的碧江方言之间差别较大，而大理方言跟碧江方言的差别则更大。其人口比例，根据徐琳和赵衍荪的统计，大致如下：剑川方言42%，大理方言53%，碧江方言5%（徐琳、赵衍荪，1984：116-127）。



南部方言以大理喜洲的语音为代表，中部方言以剑川金华镇的语音为代表，试图兼顾南部和中部两个方言（甲斐胜二，1997：59）。随后，在大理市政府的支持下，杨应新等人成立了“大理市向阳溪白文学校”，1996年，大理师专开办了白文班。<sup>1</sup>

1993年之后，创造和推广白文的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沉寂了下来。2007年夏天，我到大理进行有关双语教育的调查，本想到向阳溪白文学校了解一下情况，到大理后却被告知学校早已停办。只好到剑川县，在剑川，我们找到了进行白文教学实验的西中小学，才知西中小学校的白文教学实验也已停止，大理惟有石龙村还在进行白文的推广活动。而石龙村的推广活动实际乃是云南省民语委办公室与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东亚部的合作项目，主要的资金来自SIL，某种程度上，是SIL在推动剑川的白文推广运动，而SIL本身是一个宗教性组织，有传教的关怀。<sup>2</sup>

白文的创造与推广活动，一直受到一些白族知识分子反对，甚至在《大理学院学报》发表文章，反对创造白文（杨发祥，1982），民众的参与热情也不高<sup>3</sup>。云南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连芳总结了反对白文的两种想法：“有的同志认为学习民族语文会增加学生负担，不如来个‘直接过渡’，干脆直接学汉文算了。有的同志认为，白族从来没有白文，不论过去和现在，也产生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何必多此一举”（王连芳，1993：114）。而甲斐胜二则认为，白族文字识字运动难以推进的最大障碍则来自那些只会讲汉语的白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他们视白族识字运动为一件让他们自己落在后面的事（甲斐胜二，1997：63）。

100多年前，英国人戴维斯（H.R.Davis）对中国西南各民族间的文化过程，曾做如下描述：

……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汉族移民无疑地要与当地居民通婚，因而一种带有汉族语言及习俗的混杂民族产生了。经过几代人之后，这一混杂的民族便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汉族血统，矢口否认曾是某个部落民族后裔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随着汉族文明影响的不断扩大，邻近部落便开始有人说汉语。吸收一些汉人的习俗大大地方便了自己。终于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开始瞧不起自己部族的语言、习俗和衣着而乐于采纳汉人的生活方式。当这样的思想一旦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那么他们自己称做汉人的时代就不远了，一支本与汉人血统无缘的汉人从此产生了。

这一转换过程在中国的西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你甚至能够碰见到一些部落正处在转换得不同阶段。……（转引自许烺光，2001：15-16）

戴维斯所描述的是20世纪之前中国西南汉人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过程。而本文所试图描述的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史，以及这一近代史所体现的观念与实践，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差异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查尔斯·泰勒，2005）

<sup>1</sup>（张霞）白族语言文字工作大事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328a40100gcri.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328a40100gcri.html)

<sup>2</sup> SIL 是英语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的简写，意即“暑期语言学院”的意思。它于1934年在美国阿肯色州开办，原来的用意是为到世界各地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提供一个暑期语言训练，使他们掌握基本的语言学、人类学及翻译学的基本原理。SIL的创办人是 William Cameron Townsend（1896-1982），一位到危地马拉传教的传教士。他相信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母语圣经。1917年，21岁时，他参加中美洲宣教队前往危地马拉推销西班牙语圣经，却发现许多印第安人都不喜欢这本圣经。一位加支告族印第安人（Cakchiquel Indian）对他说：“如果你的神真是那么伟大，祂为甚么不说我们的语言？”因此，William Cameron Townsend 于1934年举行第一次语言学及翻译训练班“威克里夫营”（Camp Wycliffe）。此名取自十四世纪英国圣经翻译的先驱，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的姓氏。1935年，他成立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现称 SIL International），从事语言学研究和训练，并在各语言族群中展开工作。SIL 也致力于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并用他们的文字翻译和印刷圣经。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IL\\_International](http://en.wikipedia.org/wiki/SIL_International)以及[http://www.wycliffe.org.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93&Pid=7&Version=0&Charset=big5\\_hksc\\_s&page=0](http://www.wycliffe.org.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93&Pid=7&Version=0&Charset=big5_hksc_s&page=0)，在石龙村，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带着十字架，如今，在互联网上也能发现白语圣经布道的材料，参见<http://globalrecordings.net/program/C25971>

<sup>3</sup> 在剑川西中小学进行双语教学试验时，仅有三个班进行试验（甲斐胜二，1997：62）；我们在石龙村调查时，旁听过白文夜校的教学活动，即使在给补贴（据村民讲，参加一节课的学习，能够得到5元钱，参加一晚上的学习能得十元钱，未向项目方证实）的情况下，参与的村民也很少，访谈过程中，许多村民虽然表示，既然是白族的语言，学习一下还是好的，但很多人实际并不去参加学习，主要认为学习白文没什么用。

来概括：它追求某种独特性，并要求对这种独特性的承认，这种要求，一般指向的是民族国家，然而，中国西南地区自 1950 年代以来诸多实践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对独特性（或差异）的追求，往往又是民族国家人群分类的结果。

#### 参考书目：

- 查尔斯·泰勒，2005，“承认的政治”，收入《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290-337 页。
-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方言志》（卷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 杜乙简，1957，“‘白文’质疑”，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83-86 页。
- 方国瑜，1957，“略论白族的形成”，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44-50 页。
- 高关宇，1957，“论白族的语言系属问题”，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93-100 页。
- 龚自知，1957，“关于白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36-43 页。
- 谷忠诚，2006，“桑植‘民家人’落实白族族称始末”，收入《湖南白族风情》，谷中山主编，长沙：岳麓书社，2006 年 07 月。
-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贵州省志·民族志》（上、下册），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贵州省民族工作五十年》，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2003，《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光盘版），北京：民族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1994，《中国民族人口资料（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5，《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 黄光学、施联朱，2005，《中国的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甲斐胜二（日），1997，“关于白族文字方案”，韦海英译，载《大理师专学报》，1997 年 02 期，59-65。
- 李一夫，1957，“对白族的起源和形成的意见”，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78-82 页。
- 刘格平，“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收入《民族政策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9-40 页。
- 马曜，1957，“试论白族源出于汉代洱海区的昆明人”，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62-77 页。
- 马曜，2000，“白族异源同流说”，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 年 03 期，59-72 页。
- 秦凤翔，1957a，“略论白语的系属问题及白族的形成和发展”，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18-22 页。
- 秦凤翔，1957b，“再论白语的系属问题及白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方国瑜先生商榷”，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87-92 页。
- 任方，1957，“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131-137 页。
- 施立卓，2007，“白族族源大讨论的回眸”，载《大理文化》，2007 年第 1 期。
- 石钟健，1957，“论白族的白文”，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7。
- 孙太初，1957，“谈‘白文’”，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堃等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05 月，120-122 页。



- 王连芳, 1993, “白文工作应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载《民族问题论文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1997,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7。
- 吴万源, 1985, “关于桑植县民家人的族别问题”, 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03期, 40-47页。
- 吴正彪, 2009, “贵州‘龙家’族属考辨”, 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03期, 71-74页。
- 谢忠毅, 1997, “‘黔西北白族’源流初探”, 载《贵州文史丛刊》, 1997年01期, 86-88页。
- 徐承俊, 1957, “试论白语的系属及其他”, 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杨堃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05月, 60-61页。
- 徐嘉瑞, 2005, 《大理古代文化史》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 徐琳、赵衍荪, 1984, 《白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 许烺光, 2001, 《祖荫下: 中国乡村的亲属, 人格与社会流动》, 王芃、徐隆德合译, 国立编译馆主译,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 严奇岩, 2009, “贵州未识别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和历史成因”, 载《民办教育研究》, 2009年02期, 27-31页。
- 杨发祥, 1985, “没有必要创造白文”, 载《大理学院学报》, 1985年01期, 57-62。
- 杨堃, 1957, “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杨堃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05月, 1-11页。
- 杨堃等, 1957, 《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05月。
- 杨永新, 1986, “漫忆当年建州时”, 载《大理文化》, 1986年第6期。
- 杨毓才, 1957, “略论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南诏大理国的社会性质”, 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杨堃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05月, 23-35页。
- 叶琴侠, 1957, “对‘试论白语的系属及其他’的意见”, 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杨堃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05月, 106-110页。
- 云南少数民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大理分组, 1961, 《白族简史》(初稿), 大理: 内部资料。
- 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统计局人口处、云南省公安厅三处, 1990, 《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张福延, 1937, “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 载《南强月刊》, 第一卷四、五期合刊。
- 张丽剑, 2007, 《“民家情”: 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湖南桑植白族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 张丽剑、王艳萍, 2009, “湘鄂西白族在全国白族中的地位”, 载《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9年04期, 139-141页。
- 张正东, 1981, “关于贵州族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1981年01期, 46-50页。
- 赵式铭, 2007, “白文考”, 收入《新纂云南通志》第四册, 李春龙、江燕点校,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7-250页。
- 赵衍荪, 1982, “白语的系属问题”, 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 《民族语文》编辑部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150-157页。
- 郑天挺, 2003, “大理访古日记——西南联大师生赴大理考察”, 收入《白族文化研究2002》, 赵寅松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年, 10-53页。
-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5, 《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 1965年。
-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 1962, 《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 1962年08月。
- 周耀文, 1978, “略论白语的系属问题”, 载《思想战线》, 1978年03期, 52-57页。
- 周泳先, 1957, “有关白族历史的几个问题”, 收入《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杨堃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05月, 51-56页。

